

顾炎武的生态思想及当代启示

李佳音 刘东超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顾炎武全集》



顾炎武画像

仅涉及今人的公共利益，还涉及子孙后代的公共利益。因此，其主要的责任承担者历朝历代都是政府。在谈到地方官吏的职责时，顾炎武在《郡县论三》中说：“何谓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廩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前五项，主要就是环境建设问题。可见，他非常重视官吏的环境治理责任。在谈到地水关系的重大环境问题时，他说：“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地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道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他认为古代政府重视水路池泽的保留，重视水陆之间长远关系的处理。这样做的结果，从某一年来看可能水量不足，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足够用的。但是，宋代政和（宋徽宗年号）以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导致水土之间的失衡及水旱灾害。

顾炎武还收集了各代学者为治理环境问题提出的大量政策建议，其中有许多比较务实适用的内容。比如他详细引用了邱潜提出的让政府鼓励在边关种树和让犯轻罪的人通过种树代替刑罚的建议，以及让京城官户用煤炭代替替树木薪柴的建议。这些建议在那个时代实际上非常具有操作性和实用性。

政府的生态责任

生态问题涉及的是公共利益，不

传统与启示

顾炎武在“经世致用”原则的指导

云南在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持续实践中，不断取得新进展。全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展现新面貌。最近，云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建设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碳减排扎实推进，城乡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城市病”“有新房无新村”等问题得到缓解，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城乡发展质量、综合治理能力明显提升，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绿色生活方式普遍推广。到2035年，城乡建设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碳减排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和乡村品质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更加美好，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美丽云南。

在全面建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美丽云南的进程中，研究和剖析古人的生态思想，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中，顾炎武的生态思想值得关注。顾炎武（1613-1682年），本名顾绾，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南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是明清之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型代表，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顾炎武学问渊博，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视考证，开启明末清初朴学风气。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金石文字记》《亭林诗集》等。顾炎武广泛的文献阅读和深入的社会接触，让他具备了博洽深邃的学识。他的思想较多涉及时人不太关心的环境问题，并提出了关于生态问题的极具现实价值的思考。

关注环境变迁

顾炎武基于政治军事实用目的，分门别类整理了大量历史地理材料，许多内容涉及环境问题。比如，他记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灾害：“匈奴……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这里记载了环境异变及导致人间灾难的例子。顾炎武对环境变迁原因的探讨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将灾变原因归结为鬼神作怪，这是不科学的，但有些材料在灾害史研究上还是有价值的。

顾炎武还记载了我国古代长达千年的烧荒措施：“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他引述了以

下史料——《战国策》：“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燕荻君之国。’”《新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他还引用明代《英宗实录》中官员关于烧荒的建议：“遇秋深，率兵约日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虏马无水草可恃。”

在古代一些时期，通过将环境焚烧到寸草皆无的办法来抵抗游牧民族的进攻，竟然从战国运用到明代，可以想见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和规模。但是当时人们从防御外来侵扰的角度肯定这样的做法，顾炎武也持这样的观点。这反映了顾炎武在内的古人尚未深刻认识到这一方法对环境的破坏及危害。

尊重自然

尊重自然是中國哲學的優良傳統，在顧炎武的思想中這一傳統時有表現。在解釋《國語》中“高下天下”詞條時，他說：“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高下天下，疏川道滯，鍾水丰物。’謂不墮高，不墮卑，順其自然之性也。”這是強調在改造環境時要順从自然本性，盡量不改變原有面貌。在讲到《周易》損卦时，他引用孟子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生产过程不能打乱自然规律，说明尊重自然的重要性。他把这种尊重表达为对自然的“弗损益”，也就是不做人为的增减。他认为这既可以提高民生的福祉，也可以改善百姓的品德。他甚至认为，这会达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治理境界。他这样理解“弗损益”显然有所拔高，但高扬自然规律的价值性是正确的。他还引用南宋罗泌所撰《路史》上的话：“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故天地顺而四时成，气不怨怵，国无疵厉，而民以宁。”这里强调的是尊重“必然之理”，自然界就会顺畅运行，百姓就会得到安宁的生活，国家就能无灾无祸。

节约资源

顾炎武的著作中有明确的节约资源意识。他谈到对资源不足的担忧和开发资源的建议。他叙述了古人对动物资源的珍惜和重视：“其平日，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用大牲则卜之于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载齐国之制，公膳止于双鸡。而诗人言宾客之设，不过免首鱼鳖之类。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这是讲尽量简朴地生活来减少宰杀畜禽，这是古人的生活哲学，顾炎武对此非常赞同。

对于当时浪费资源的奢侈之风，顾炎武引用别人的话提出了批评：“‘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教之之上

云岭遗珍



今年春节前夕竣工开放、正在开展征名活动的跨大观河一号桥

万里归来续旧游，眼前风景足淹留。天涵水面浮双塔，池涌波心耸一楼。这首清代文人段时恒的《登大观楼》诗，写出昆明大观公园之特色。大观公园地处昆明城西滇池之滨，因园内大观楼而得名，历史悠久，风景秀丽。

历史名园 时兴胜景

明代以前，此地原是一片水浦湿地，与茫茫滇池的草海相连。明初，曾在滇北建了一座西园，因接近太华山，故称近华浦。清初，开挖篆塘和运粮河（即大观河），沟通省城到滇池西南各地的水路，于是此地便逐渐兴旺起来。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云南巡抚王继文等地方大员见此地“远浦遥岑，风帆烟树，擅湖山之胜”，于是在此大兴土木，挖池筑堤，种花植柳，相继建

起华严阁、催耕亭、观稼堂、涌月亭、澄碧堂、怀古廊、大观楼等，又修筑了沿湖港湾和湖中岛屿，近华浦便成为省城近郊之游览胜地。特别是清乾隆年间孙禹翁创作大观楼长联，冠绝古今，更是使大观楼名扬四海。清道光八年（1828年），云南按察使翟锦将大观楼由二层重修为三层。清咸丰七年（1857年）大观楼毁于兵祸。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年），云南提督马如龙又重建大观楼，这就是今日所见的大观楼。1918年，唐继尧将大观楼所在地辟为公园。后又经增修，逐渐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大观公园。

大观公园碧水涟漪，长堤垂柳，楼外有楼，景外有景，既有湖光山色之胜，又有古典园林之幽，堪称昆明最迷人舒心的湖滨公园。近年来，公园适时整修，不断举行花展，千姿百态，四时开放，引得远近游人，闻讯而来，热闹非常。

拱桥如虹 连接三园

今年新春佳节，大观公园举办牡丹花展，富丽妖媚，争奇斗艳。更有海鸥翔集，人鸥成趣，给春节增添了无限情趣。以往的大观公园称为北园，开放面积约430亩；与北园隔水相望之南园，原为私家园林，分为庾家花园、鲁家花园两处，面积共约400亩。过去南北两园因大观河相隔，欲到南园游览需绕道而行，或要乘船摆渡，来往不便。

大观楼南园的“庾园”即“庾家花园”，又称“庾庄”，系民国初年昆明市长庾恩锡的别墅，始建于1927年。园中既有中式亭廊阁榭，又有西式建筑园景，主要



鲁园中的石舫

西南联大 足迹觅踪

大观公园风光奇美，空间开阔，向来均为游园聚会之适宜场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之后，这里也就成为师生们举行课余活动的常来之地。1938年5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长途跋涉来到昆明之后，在大观公园举行答谢会，欢送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他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派来任旅行团团长的。后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和生物系的同学到西山考察地质状况，采集生物标本，多是从大观公园坐船到滇池对岸的西山。

1940年9月12日，昆明青年会在庾园举行集会，此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中共地下党员龚普生，她是燕京大学高材生，长期以女青年会干事身份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夏，龚普生从重庆来到昆明，即联系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等人，以青年会为依托开展妇女救亡活动。此次在庾园聚会，先由曾昭抡讲演国内外局势及抗战前途。接着由朱友渔主教讲抗战时期女青年会的任务。曾昭抡当日的日记载：“朱口才甚好，演讲中夹以故事及诙谐，令人动听。讲完在外休息照相后，继续开会，由各部分负责人报告，嗣后加以讨论。社会服务部潘学黎小姐报告中，提及女青年会在纺织厂内所办民众学校，成绩卓著。所组织之友光团，提倡长途旅行，等等，尤受工人欢迎。”1940年10月12日上午，应西南联大群社之约，曾昭抡再到大观公园，参加青年会举行的野餐会，欢送龚普生辞别昆明。龚普生回到重庆后，受周恩来委派赴美国留学。1948年回到西柏坡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这是后话。

明代杨慎有《春望》诗咏大观园：东风先到海东头，春兴催人独上楼。最是晚来凝望处，曲堤烟柳似皇州。让人留恋难忘的大观名园，愿你生机焕发，适时出新。

（作者地址：云南广播电视台）

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

王元翰：直言敢谏 勇斗贪腐

肖建乐 包广宽



王元翰画像

王元翰（1565～1633年），字伯举，号聚洲，云南宁州（今华宁）人。他忠于职守，虽官微言轻却以仗义执言著称，力图荡清明朝末期官场污浊之风，是明朝有名的廉官，“意气凌厉，以谏诤自任”。

秉持公心，不徇私情。明代后期，结党营私日益严重，拜官公朝、谢恩私门之风盛行。王元翰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考取进士，同考官即为当朝首辅沈一贯。沈对王元翰极为看重，认为其“笔舌互用，腕有鬼工”，将其擢列为进士第五名，视其为门生。成为朝廷达官显贵的门生故旧，历来是进入官场圈子的一条捷径，别人对此趋之若鹜，而王元翰则避之不及，即使沈一贯主动派人示好也不为心动，还义正词严予以反驳：“知己之恩，同于再生，生何敢忘！然而人臣无私交，使相君而开诚布公，生请北面精谨以事之；不然者，庇私门而忘国恤，负相君莫大焉。千古不愧师门，唯罗莽正之于李南阳耳！”

王元翰不攀附权贵，公开抵制“宁负朝廷，不负举主”的为官潜规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充分彰显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这在结党营私日趋严重的明末时期，更显得难能可贵。王元翰不愿加入朝廷中的团团伙伙，他抨击时政、揭露时弊的正义之举在不正之风盛行的当时显得尤为另类，被视为朋党代言，使忠于履行言官职守的王元翰日益成为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一己之力，勇斗贪腐。明崇祯时期，党争频繁，政治生态恶化。王元翰秉持公心，直言敢谏，不畏权贵。他直斥明神宗怠政，陈述天下的弊端，建议明神宗“一日责法令之行，二日专会推之权，三日慎名器之重，四日广赐闻之诏，五日严奏辨之妄”，并列举了当时可痛哭者八件事，收录于《神宗实录》：“丁酉，工科给事中王元翰言时事可痛哭者八事。”王元翰嫉恶如仇，言语犀利，一针见血。首辅沈一贯权倾一时，朝中无人敢惹，王元翰不畏强权，弹劾其结党营私、袒护邪臣。此外，王元翰还先后参劾过“勒索商民”的太监杨致中、“横噬噬商”的内官王道、“顽钝污秽”的两广总督戴耀和福建巡抚徐学聚、“生事误国”的贵州巡抚郭子章等。正因他为民请命，敢于触龙颜、惹权贵，受到云南道御史弹劾，被诬陷贪污。王元翰为自证清白，将家中所有财物悉数搬出，却难证清白。作为一名言官，他至死也没等到自己冤屈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由此可见政治生态恶化的明朝后期，一个为官者欲恪尽职守，以天下为己任固然不易，就是独善其身也是非常困难。以至于一些人虽有心忧天下的拳拳之心，亦有无私无畏的行为，却难以有所作为。

心系家乡，寄情山水。王元翰虽有拳拳报国之心，却为官场不容，仅做了4年言官便不再起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王元翰返回家乡，在抚仙湖畔闲居，撰写了大量借景言志诗句。他在《泛抚仙湖诣孤山用壁间韵》一诗中描写了抚仙湖与孤山：“闲赋沧浪濯濯纓，湖山萧瑟趁秋晴。山当孤处群松伴，湖以仙名一鹤横。”借抚仙湖与孤山的青山绿水之景，言自己洁身自好之志。寄情山水虽可一时聊以自慰，但作为一名有志之士，王元翰还是难掩惆怅之情。此时的他仍心怀百姓，对朝廷还抱有幻想，期待朝廷能重新起用他。天启元年（1621年）仲春，“奢安之乱祸及云南，元翰捐谷募兵，以助防会城昆明”。虽然历经坎坷，经过家乡青山绿水长期浸润，王元翰直言敢谏之心依然没有改变。

虽然王元翰至死也没能洗刷掉被诬为贪官的耻辱，但是在其离世后，一系列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恢复了名誉。其中，《明史·王元翰传》称：“元翰居谏垣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阉，挂贵近，世服其敢言。然锐意搏击，毛举鹰鹯，举朝咸畏其口。”工部侍郎刘宗周在为王元翰撰写的《墓志铭》中说：“余既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党，晨星尽矣，余而不忘公，又谁为忘公者？”倪元璐在《王谏议传》中称赞其为“人杰”。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纪检监察学院、云南廉政研究中心）

云南省纪检监察学会
云南日报 联办
云南廉政研究中心